

收稿日期:2023-03-10

互助合作运动中剩余劳动力的解决途径研究

——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的比较为视角

吴云峰

(黄山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华中抗日根据地在组织互助合作运动过程中,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面临着农村劳动力过剩,互助难以巩固的问题。针对人多地少,劳动力有剩余的状况,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开展互助合作中加强对劳动力的合理规划,组织劳动力合理流动,发展副业,将互助组与合作社结合起来,推行精耕细作,增加对农副业的投入。通过这些措施,较好地解决了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发掘了乡村的生产潜力,激发了民众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的活跃,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互助合作事业的巩固。

关键词:华中抗日根据地;互助合作;剩余劳动力;陕甘宁边区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3)03-0017-08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学科(专业)拔尖人才学术资助项目“华中抗日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研究”(gxbjZD2022061)。

作者简介:吴云峰(1981—),男,安徽歙县人,黄山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3.03.033

抗战时期,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领导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关于根据地互助合作的研究,近年来学界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在已有的研究中,对互助合作的渊源、组织形式、运行方式等问题讨论得较多,但对互助合作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及解决方法关注不多,尤其是对不同根据地之间的比较研究相当缺乏。不同的根据地之间在农业种植结构、人地关系上有较大的差异,各根据地是如何因地制宜地制定对策,确保互助合作运动巩固发展的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进一步拓展互助合作运动的研究范围,促使研究更加深入。

一、华中抗日根据地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与剩余劳动力问题

与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华中抗日根据地也开展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194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取按家计划、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愿和等价的原

则下,把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1]1944年1月4日,中共中央华中局也发出了《关于组织农村劳动互助、劳动合作与发展生产的指示》,提出:“各地必须根据延安发展生产以及如何组织劳动合作的经验,配合各地个别具体的实况与当地群众的生产经验,在群众自愿原则下普遍提倡和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劳动合作运动,并把提倡劳动互助与组织劳动合作作为领导农民发展生产的主要宣传教育与实际计划内容。”^[2]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办了为数众多的互助合作组织,涌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合作团体。淮海根据地有王维德互助组、王业久合作社,淮北根据地有耿道元纺织合作社,淮南抗日根据地有杨言德合作社、骆腾云互助组等。

淮海根据地1945年5月统计资料显示,劳动互助组织在淮海根据地各县广泛建立(表1)。

表1 淮海根据地各县互助组统计

地区	1944年					1945年				
	甲等组	乙等组	丙等组	丁等组	合计	甲等组	乙等组	丙等组	丁等组	合计
泗沐						59	410	1 208	1 051	2 728
涟水	81	269	327	203	880	178	485	644	284	1 591
沐阳						6	69	484	889	1 448
灌云						19	137	214	348	718
淮阴	17	309	695	1 212	2 233	43	296	923	634	1 896
东海	5	27	1 529	—	1 561	18	259	1 508	—	1 785
宿迁						86	472	1 189	—	1 747
宿北						17	69	23	49	158
总计	103	605	2 551	1 415	4 674	426	2 197	6 193	3 255	12 017

资料来源: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合编《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江苏部分,第三卷),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78页。

1945年7月,淮南抗日根据地殿发乡互助合作运动广泛组织起来。“全乡一共搞起来六十三个组(全乡八个村都有)。全乡全劳动力一三八八个,已经组织起来一二〇三个,占百分之八十七;全乡人口一九七〇人,其已经组织起来一六八三人,占百分之八十五;全乡四七一户(其中二十一户无土地),已经组织起来三七六户(其中富农三八户,中农一四〇户,贫农一九八户),占有土地户数的百分之八十四弱;全乡九二三石四斗五升种,参加互助的七九四石七斗五升种(其中富农土地一〇三石六斗,中农土地四一九石八斗五升,贫农土地二三六石七斗),占百分之八十六。全乡一六七张犁,已经组织起来一四八张犁,占百分之八十九弱。”^{[3]550}互助合作运动在根据地乡村社会普遍地开展起来。

互助合作运动大大提高了劳动的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根据地乡村由于战争等因素造成劳动力缺乏的问题。但华中抗日根据地乡村劳动力的缺乏问题是相对的,只是在农忙的时候缺乏,而不是常年缺乏。相对于陕甘宁边区来说,华中抗日根据地地狭人稠,农民占有的土地资源并不多,劳动力过剩反而是常态。那么,在互助合作中,根据地是如何化解过剩的劳动力,确保互助合作能长期稳定地运行的呢?

1945年5月,淮海地委书记万众一在《春耕工作总结》中谈到了淮海地区互助合作中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亟待解决,他指出:“互助组与合作社没有很好结合,剩余劳动力没有更好地使用,在春耕中合作社纺了很多纱,运输不少东西,但很多都没有和互助组结合起来办,我们没有更好地把各种生产事业与互助组配合起来,有计划地吸收互助组的剩余劳动力。”^{[3]272}

时任盐城县委书记的周一萍在《盐城组织换工生产的主要经验》中讲到：“水田地区农作特点之一，是农作季节的间歇性，闲时太闲，忙时太忙，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由于实行集体劳动之后，劳动效率是大大提高了，同时实行了‘按成评工制’，更加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这样的结果，使农忙季节大大缩短（过去栽秧须十天才能结束的，现在仅七天就能结束了），农闲开始，农民出卖劳动力的机会，更加减少。因此，怎样替剩余劳动力找出路，已是组织和坚持换工后的一个大的问题。”^{[3]314} 只有对剩余劳动力进行合理的安排与使用，才能确保互助的持久性。

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互助合作中主要的问题是劳动力缺乏，只要将农民组织起来，就能比较容易地提高生产。如吴家枣园式的变工，“这个变工队由于附近有荒地，而且由于有领导地造成了热烈的开荒运动，所以开荒最多，增加粮食最多”^{[4]43}。陕甘宁边区农业垦荒的潜力大。1944年，陕甘宁边区土地面积是92710平方公里，人口1424786人，边区人口的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5.2人^[5]。陕甘宁边区在抗战之前的土地革命期间，地主土地所有制受到冲击和限制，农民占有的土地是相对丰裕的。从1937年到1943年，“边区的耕地面积逐年来迅速扩大，农业人口不断增加，牲畜和粮食收获量也是不断上升。特别是在经过了土地分配的地区，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劳动力的增加速度是远落在耕地面积的扩大之后，在这些地方，虽有大量移来的新户，而劳动力仍感觉不足”^{[4]23}。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人地矛盾比较尖锐。以新四军新军部所在的苏北地区为例，据《盐城县志》记载，1935年，盐城县人口为243537户，1141226人^[6]。1946年春“全县耕地约118万亩，其中地主占有38万亩，占总耕地的32%，人均16.81亩；贫农占有耕地15万亩，占总耕地的13%，人均0.65亩”^[6]。据《靖江县志》记载，土改前，靖江县的人均耕地为1.54亩^[7]。1935年，泗洪县境内每平方公里为123.20人。由此可见，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密度要比陕甘宁边区高很多。

在传统社会，生产的安排是自发和散漫的，农民往往只在农忙季节开展临时的互助。根据地的互助合作运动普遍开展后，劳动效率得到较大的提高，这一方面解决了生产中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使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了。在农忙季节结束以后，只有帮助闲散劳动力寻找出路，将其合理地运用于生产运动中，才能保证互助合作的长期稳定开展。1944年，淮海抗日根据地涟水县光明乡的劳动互助组经过突击组织起来，但在春耕后，在锄春田中，就有一半人不参加互助了。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有的成员觉得春耕时间不太忙，可以拖延时间，不感到劳动力缺乏^{[8]438-439}。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大鲍庄互助组“互助如果事情接住头，大家就有兴趣。如果时间长没事做，大家情绪就会低下去”^[9]。只有对剩余的劳动力进行合理的安排，才能促进互助合作的巩固。

二、华中抗日根据地对剩余劳动力的解决途径

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乡村的生产效率有所提高。但是，如何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保证农民常年有活干，生计能得到保证，互助合作能长期巩固，是根据地在组织互助合作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华中根据地针对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加强对劳动力的合理规划

互助合作的巩固关键在于要有合作的内容。传统社会，农忙时节农民往往自发组织互助，而在农闲时，就不需要互助。因此，传统互助是临时性的、季节性的。根据地在举办新型互助时，要巩固互助，则需要为互助组织安排实质性的业务。有实质性的业务，才能使成员可以持续获得一定的收益。在淮海根据地，1944年由于没有注意到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使一些贫农和中农

感到吃亏,互助组成了勉强的结合。《淮海报》的社论提出:“解决这一个问题,首先是加强使用剩余劳动力的计划性。在目前技术条件下的农业加工之后,所有的剩余劳动力,应当在小组计划与兴家计划中有个总的估计,究竟剩多少?剩些什么劳动力?并根据实际情形订出经常的使用计划,什么时节?如何使用?(如夏收前运输夏收用具,秋收时榨油,及农闲时的纺织等。)这一计划能否实现的关键,即看是否通过群众路线,我们应当领导群众自己来订,而不是去年那种不切实际的计划。”^[10]在生产互助中,只有对剩余劳动力进行合理的调配、安排,才能提高互助合作的效益,解决民众的生计问题。剩余劳动力的使用要结合当地的生产情形来开展,才能有的放矢。此外,剩余劳动力的安排还要结合群众的需要,尊重群众的意愿,需要打通群众的思想,进行深入的动员。该社论指出:“通过订立这些计划,使群众自觉地了解副业上的劳动所得,可以抵去农业上的劳动所失,这一思想打通了,群众就不会顾虑互助起来吃亏,就不会怕出工资,或苦不到工资。互助起来,省下工可以做别的事获利,这样看很简单,但群众不经过深入说服及亲身体会到这道理,互助组的巩固是很困难的。”^[10]要解决互助合作中产生的剩余劳动力的问题,需要互助合作机构对剩余劳动力的多少有个总体的估计,并对此进行合理的规划、使用。如淮海根据地泗沭县王维德互助组在割麦时,大人小孩一起下田,一块地上涌进了26个人,看起来很快,一刹那就割完了一块地,大家也蛮开心。可是到晚上算,平均每人只割了1亩2分,平时一人可以割到1亩7分。大家研究了原因,是因为乡下地块小,不是大块集中地,割完这块,再割那块,浪费很多时间。经过商量,互助组决定把二十几个人分为4组去割,提高了效率。

(二)组织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各地区由于种植结构和气候等因素不同,农作物的播种、管理和收获时间不完全一致,因此,农忙的时间也有先后之分。组织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才能避免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使闲散的劳动力可以发挥作用,也能使农民获得一定的报酬。

传统社会,盐阜地区就存在集体卖工的互助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实现较大范围的劳动力调剂。由于各地农事季节有先有后,贫苦农民便组织起来到需要劳动力的地区去集体出卖劳动力。在集体卖工中,除了出卖人力外,还有集体出卖畜力的,如在水稻收割季节,苏北旱田地区的农民便牵着大批耕牛前来帮工,这种情形,在盐阜地区很普遍^{[11]49}。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人多地少,农业的产出难以维持生计,只有设法转移剩余劳动力,才能避免内卷化的问题。苏中三分区的包工法,就是“在一村或一乡内,捡劳力特别过剩的人家,集合若干人,成立包工小组,用以补助伴工的不足”^{[11]700}。

在盐阜区,无地缺地,以贱价零碎出卖劳动力作为生活来源的劳动力,在各地都有一定数量,特别是水网地区,人口密度较高,这些劳动力绝大部分都是流散到江南做苦力。抗战以后,劳动力的流动有一定困难。盐阜根据地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办法是吸收他们参加换工小组,以劳动力和中农富农取得交换关系,并保障短工法定工资的实现。此外,根据地还成立以村为单位的短工队、短工小组,管辖村乡雇佣劳动力,求得统一工资。短工队一般采用集体劳动方式,采取估收包工制,与富农及经营地主进行合作。当短工队在本庄本乡生产完毕或本乡劳动力的剩余量超过需求量时,则集体或分批到外区出卖劳动力。在水田和稻麦田地区,旱地与水网地区,因为农作时间有差异,更便于组织大包工、大换工。通过对剩余的劳动力进行合理调配,根据地有效解决了农民的生计问题。

(三)增加生产投入,发展副业

在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地矛盾就已经比较突出。因此,农民往往用深耕细作,增加

劳动力、肥料等投入的办法来提高单位面积的收获。虽然这不能带来效率的提高,但这是应对耕地面积不足,解决家庭生活问题的有效办法。黄宗智在谈到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松江县的棉手工业时指出:“农户不会以粮食消费来计算劳动力成本,因为不管怎样,这些家庭成员都是必须供养的。小农考虑的只是扣除原料、工具的生产成本后的毛收入。只要毛收入超过生产成本,即使附加的活十分艰辛、收益又低,迫于生存压力的小农也会将其成员的劳动力投进去。”^[12]

与陕甘宁边区不同,华中抗日根据地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种植结构与陕甘宁也明显不同。如盐阜地区有不少水田,水田地区农作的特点是间歇性。实行集体劳动之后,劳动效率大大提高,农忙季节大大缩短。农闲以后,农民出卖劳动力的机会更加减少。怎样替剩余劳动力找出路,成为组织换工以后的一个大问题。盐城县采取了集体开荒、增加劳动力投入的办法来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盐城西部的荡田地区,除了长芦苇以外,就很少有其他农产品。农民面临两大困难:一是芦苇缺乏销路,米缺乏来源,二是割芦苇季节过去以后,劳动力无法出卖。因此,北莘野的贫农,在“开荒可以增加粮食”“开荒可以解决劳动力过剩”等口号下组织起来,成立了开荒队,利用春闲集体开荒。史德祥小组集体开荒10亩6分,他们除了集体劳动开荒以外,还集体挑草,将草卖掉,买种子,种黄豆、棉花、茨菇。根据地还组织农民集体经营副业,如清镇的杨莲春小组,全组集体经营豆腐店。胥月云换工队集体举办消费合作社。此外,还有的换工组集体推虾、捞河泥积肥。副业的发展,搞活了乡村的经济生活,也很好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为了解决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华中抗日根据地在互助合作中注重实行深耕细作,通过增加对农副业的投入来提高生产。如苏中抗日根据地人多地少、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在乡村虽然存在,但不是很突出,一般是带有季节性的,往往在农忙时期劳动力短缺。互助合作以后,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劳动力更加富余了。为了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根据地的解决办法是:“(1)深耕细作,如打土块、上粪、筑圩、开沟、横田起猪圈、盖茅坑、多耕田等。(2)开荒。(3)多养牲畜,多增副产品,扩大伴工范围,举办合作事业。(4)出外做短工。”^[13]

淮海根据地也是地少人多,注重深耕细作和增加对农、副业的投入。陕甘宁边区待垦的荒山较多,可以通过开荒来增加耕地面积,而淮海区只有一部分坟地和少量的河滩地或不太适合生产的碱滩地,熟荒很少。因此,互助合作只能通过深耕细作来提高生产。李一氓讲到:“在陕甘宁边区只要有劳力,有种子肥料,就可以开荒,今年种五十亩,明年可以种一百亩,贫农中农上升比较容易。而在淮海区因为土地面积有限量,即或土地转移,亦不会怎么快怎么大,这就产生了贫农中农上升的限制问题。”^{[8]100}

王维德互助组在开展农业生产时,注重肥料等方面的投入。“王维德互助组开始组织起来时,就注意到农业上加工加粪和有计划地发展副业,去年全组多收粮食八千六百九十斤,平均每亩增产二十五斤,今年又有计划地领导全组造粪起汪泥,并计划每亩地比普通的农民多锄两遍,至于副业方面,去年搞纺纱、运盐、刨树等业务,获利达三十万元,全年又继续发展纺织等,向王业久合作社追赶,所以王维德互助组不仅本身是巩固的,而且很久以前就在全县互助组中,起着带头作用。”^[14]在互助合作中增加劳动力、肥料等投入,能够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从而保证农民的日常生活需要。

沭阳丁长泰互助组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合理使用剩余劳动力:“(1)找雇头,月工或日工,替人家做活(得工资归己有)。(2)搂草,以大笆搂麦叶与麦穗。(3)运输:挑盐或挑青货(没本钱的帮助解决)。以上数种,得益处的处理办法,是除自给应付出的工资外,余皆归己有。”^[15]在非农忙季节,将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别的行业,可以解决内卷化的问题,提高互助组织的效益。

在未互助前,土地较少的贫农在农活忙完以后,往往会以充当雇工、出卖劳动力来赚取工钱。

互助以后,劳动效率提高,需要雇佣的劳动力相对减少,贫农参加互助以后,也不能私自充当帮工。贫农如果得不到工资会降低对互助的积极性,单靠提高工资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只有在合作中发展副业,才有出路。如涟水县光明乡在互助中围绕农业,发展副业。通过翻碱以解决土地问题,积肥以提高农业生产,通过纺纱、织布、运销,使农民获利。华中根据地通过发动农民增加对农副业的投入,合理安排了劳动力的使用。根据地倡导的新型互助虽然对传统的互助进行了必要的提升和改造,但是对传统互助的合理因素和可行做法也进行了继承和延续。这也说明了互助合作运动不仅要遵循近代经济运行的规律,也要因地制宜,结合本地的经济结构、人地比例等实际因素采取相应的对策,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

淮海根据地泗沭县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县,全县有26万人,平均每人只有2亩9分地,由于土地分配不均,广大贫农缺乏土地,即使在丰收年成,还须购入粮食以弥补不足。因此打油、养猪、倒树等副业,对群众经济生活有特殊的重要性。实行互助以后,大批的剩余劳动力也需要寻找销路。没有副业,互助组就不可能巩固。该县的陈维芳、王业俊就采取农副结合的方式,在同一时期内,农业工资和副业获利由股金公积金和工资劳动按一定比例分红。农业劳动可以分到副业所赚的红利。王维德互助组还通过组员唱书、开牛行等形式发展副业。该互助组“种田纺纱做生意(主要是卖小牛换大牛)都选专人负责,种田的人负责种全组的田,不记工。推炭推盐所卖的钱,除提百分之二十的辛苦钱和股金一分五厘利,其余大家平分”^[16]。泗沭六区的丁相之互助组由小组出资本,轮流规定组员搞副业,于所获利中提一部分红利给副业劳动者,其余分给大家,兼顾了农、副业双方的劳动。郭铁民认为:“合作社比较适合于服务行业,而不太适合于工农业生产。其中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农业劳动具有分散性、季节性,劳动量在计算上有困难,按劳分配往往很难准确反映劳动者的实际劳动情况,难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因此,农业更适合于家庭经营。二是工业往往要求规模经营,需要较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而合作社的局限性就在于筹资比较困难。”^[17]而副业的经营比较灵活,所需资本少,对气候等因素依赖程度低,分红的办法也比较简便。因此,发展副业对巩固互助是非常有利的。

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马立功互助组共由4家组成,16口人,男9口,女7口。全劳动力8口,半劳动力8口,全组自家地13亩1分,佃入及当入22亩半,共种35亩6分。因为人多地少,地不够种,剩余劳动力太多,1945年,乡政府提倡种棉花,马立功认为合算,种了9亩,但肥料没办法解决。本庄的地主大塘有20多年没有干过,里面的泥都沤黑了。马立功提出推塘泥下地,但须跟地主交涉。大家提出三五、六五分。共推了3500车,除了分给地主的,余下2000多车。有人主张把塘泥卖了,有人主张用于施肥。经小组会讨论,决定用于施肥。施肥后的棉花每亩能收瓢子100斤。该组的副业生产从互助组组织起来后,才半个月,贩酒、贩烟共赚12500元,贩草2趟,8车子赚了5500元,通过发展副业,该互助组渡过了春荒^[18]。

通过增加生产投入,积极发展副业,华中抗日根据地妥善地解决了劳动力剩余的问题,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活跃。

(四)把互助组与合作社的业务结合起来

淮海根据地通过互助组与合作社结合的方式,来吸收剩余的劳动力。合作社的规模相对比较大,具有长期性,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比较大,如果经营得当,还可以扩大业务范围。

《淮海报》的社论《注意剩余劳动力的使用》一文指出:“正确的办法应当是把互助组与合作社结合起来,即是说农业互助与副业合作结合起来。合作社需要劳动力,互助组劳动力有剩余,只要我们一方面在领导上加强合作社使用劳动力的计划,吸收互助组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互助组的负责人经常与合作社取得联系,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10]除了将互助组与合作社结合起来,该

社论还主张发展多种经营。“还可帮助互助组组员发展原有副业如编柳、织席、拐粉、挖树、榨油等,这些副业也是社会上不可缺少的,互助组不要因为它没有合作而妨碍它,限制它,应当帮助它发展,虽然是私人经营,总比把剩余劳动力闲着的好,而且可以逐渐提高到合作经营。”^[10]合作社的业务涉及人民生活需求的方方面面,受季节影响有限,所以能很好地吸收劳动力。

三、利用剩余劳动力的意义

华中抗日根据地在互助合作事业中加强对剩余劳动力的规划和安排,取得了积极的效果。1945年6月,淮海抗日根据地的涟水县召开了各区联社正副主任会议,讨论纺纱对老百姓的生活改善的意义,并交换了办纺织合作社的经验。岔庙区报告了该区郑大奶奶家里有二辆纺车,只纺了20多天,就得到了纺纱工资大约8笆斗(约合500多斤),能够供给全家吃穿用度。此外,跨河区也报告了涟南村纺纱小组共18户,16辆纺车,其中7辆经常纺织。从1945年春至5月底,共赚了54000元,带动了不经常纺纱的9辆纺车也动了起来。还有一户严常氏,1944年12月以7斤棉花开始纺纱,得到的利润,除了给小孩做2套小褂裤、大人做一个棉袄面子及一件大褂子外,还剩余了2500块钱和1担6斗的大麦,大家都看到了纺纱的好处^[19]。通过互助合作,发展纺纱,乡村社会的闲散劳动力及生产工具被有效地整合、利用,增加了物质财富,满足了农民的衣食需求和家庭开支,有效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淮海抗日根据地通过对兴家计划的检查,确保兴家计划的顺利推行和剩余劳动力的充分运用。涟水县江以举的兴家计划,不但彻底实行了,而且还超过了计划。他家原订春天每亩上6挑粪,结果春耕时每亩上到10挑以上,原订每天纺一两五钱纱,他母亲每天都能纺三两。参加榨油合作社,预计获利六百元,后来获利一千元以上,还养了一头猪。各方面生产超过了原订的计划,生产积极性比上一年得到提高^[20]。

泗南县峰山乡基干队开展互助,进行集体生产。根据队员的技能,在农闲时间组织了杀猪、捉鱼、贩草等小组,他们从1943年腊月到1944年2月,杀了肥猪20口,赢利六千元,腊月上半月天气还不冷,队员捉鱼得利五千元,队员还从双沟贩草到峰山去卖,赢利二千元。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共赢利一万三千元。经过全体基干队员的讨论,此款一部分给队员,另一部分作为当年春天生产的基金,用于解决基干队生产的困难^[21]。根据地在生产互助运动中,通过对剩余劳动力的合理安排,解决了民众生产生活的困难,增加了农副业收入。

针对人多地少、劳动力有剩余的状况,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开展互助合作中加强对劳动力的合理安排,发展副业,组织劳动力合理流动,将互助组与合作社结合起来,增加对农业的投入。通过这些措施,较好地解决了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发掘了乡村的生产潜力,激发了民众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的活跃,增加了群众的收入,也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促进了互助合作事业的巩固,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12.
- [2]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江苏省档案馆.中共中央华中局[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233.
- [3]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江苏部分,第四卷)[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 [4]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七编,互助合作)[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 [5]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总论)

- [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15.
- [6] 盐城市郊区地方志编纂委员. 盐城县志[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 [7] 靖江县志编纂办公室. 靖江县志志[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168.
- [8]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江苏部分,第三卷)[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 [9] 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 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一)[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523.
- [10] 注意剩余劳动力的使用[N]. 淮海报,1945-05-17(1).
- [11] 史敬棠,等.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上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 [12] 黄宗智.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 北京:中华书局,2000:85.
- [13] 江苏省档案馆,南京师范大学抗战研究中心. 中华抗战期刊丛编(6)[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339.
- [14] 刘华. 介绍王维德互助组和王业久合作社[N]. 淮海报,1945-05-29(4).
- [15] 鲍正华. 介绍丁长泰互助小组[N]. 淮海报,1945-07-07(1).
- [16] 泗沐王维德互助小组完成春耕发展副业[N]. 解放日报,1944-05-26(2).
- [17] 郭铁民,林善浪. 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史(上册)[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8.
- [18] 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 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五辑)[M]. 1985:278-279.
- [19] 涟水研究纺织工作经验,小组社容易发展获利[N]. 淮海报,1945-06-09(1).
- [20] 春耕生产运动总结专辑[N]. 淮海报,1944-05-29(3).
- [21] 方忠国,钱明道. 峰山乡基干队集体生产,杀猪、贩草、捉鱼,两个月赚利一万三千元[N]. 拂晓报,1944-02-17(1).

The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in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n Central China Anti-Japanese Bases and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WU Yun-feng

(School of Marxism,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Anhui, 24504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the productivity has been enhanced in Central China Anti-Japanese bases, notwithstanding the rural surplus labor force, and insufficient mutual aid. Therefore,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to realize the rational deployment and transfer of labor force, development of sidelines, strengthening of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promotion of intensive cultivation, and increased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and sideline industries. The surplus labor force has been effectively transferred, together with the fully exploited production potential, the motivated enterprise and initiative of the farmers, invigorated rural economy, enhanced living standard, and consolidated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Key words: Central China Anti-Japanese bases;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surplus labor forc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责任编辑:朱 根〕